

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

六
龜

兵法之瑰宝
韬略之精髓



华艺出版社

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



卷

编文：鲁民 鲁军

绘画：王宣铭等

兵学之瑰宝

韬略之精髓

出版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论在政治、思想、军事、经济和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创造，在世界文明史上名重位尊。特别在军事领域，更是异彩纷呈，经历过许多威武雄壮的战争，出现过许多军事家、著名将帅，有许多著名的军事典籍，有许多战略、战法、韬略、计谋，有许多军事史上光辉夺目的创造、发明和奇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继承和发扬古代的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是我们在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中，帮助广大青少年朋友和解放军、武警战士学习历史文化、树立民族自尊心和增强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目的，我们从现存的上千部古代兵书中选择了用兵韬略方面最突出的《武经七书》、《孙膑兵法》、《百战奇法》、《兵经百篇》等十多部兵书，用漫画的形式将古人的智慧展现在读者面前。

韬略，即计谋、筹策、战略、策略等的总汇。古代兵学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这里所说的韬略，就是兵权谋所包括的谋攻、庙算、诡道、用奇、应变、用间等智谋。智是谋的基础，谋是智的升华，二者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智谋双全，足智多谋，造就最高明的将帅，是可以做得到的，但都必须会运用韬略，善于龙韬虎钤。打开中国古代战争史，诸如围魏救赵、远交近攻、假道伐虢、背水一战、三鼓而竭、增灶退敌、减灶胜敌、暗渡陈仓、空城计、以斗量沙、擒贼擒王、走为上计等，都是运用韬略的典范。同时，古人在用兵当中还出现过孙武吴宫教战、吴起嘴吮毒疮、田忌赛马等为世代传为佳话的故事。所有这些都会在这套漫画丛书中活灵活现地反映出来。广大读者可以在茶前饭后的稍许时间内，打开漫画，既是艺术欣赏，又可以从中获取智慧，受到启迪，使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大展宏图。

为了出好这套漫画丛书，我们聘请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长期从事古代兵法研究的专家吴如嵩做顾问，并请他为这部丛书写了序。脚本是由军事理论水平较高并富有军事实践经验的同志，根据国内有关专家的研究专著改写而成的。绘画是擅长画古代内容的知名画家完成的。在此，我们谨向他们和其他为这部丛书的出版作了努力的同志深致谢意。

华艺出版社

1991年9月

序

在当前的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阵地——军事谋略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并有从军到民,从学者群扩展到千家万户之势。《中国古代用兵韬略》漫画丛书,便是顺应这一文化趋势,为青少年朋友和解放军、武警战士同志们出版的一系列著作。

其所选之书,都是诸如《武经七书》、《孙膑兵法》、《百战奇法》、《诸葛亮用兵韬略》之类兵学名著。把这些艰深的古代兵书变为当今青少年所喜欢阅读的漫画著作,要做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真正能让他们从中领略古人的用兵韬略、智慧之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华艺出版社与编绘者们通力合作,这套丛书将陆续问世。我高兴地向读者推荐,它展示给我们的将是祖国灿烂文化中的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珠玉。

是为序。

吴如嵩

1991年6月25日

顾问：吴如嵩
主编：孙 波
副主编：杜建业 孔德骐
编 委：孙 波 杜建业
孔德骐 林 锋
兰 波

目 录

出版前言	(1)
序	吴如嵩(3)
《六韬》的作者	(1)
《六韬》这本书	(7)
《六韬》对后世及国外的影响	(15)
<hr/>	
姜太公传	(21)
<hr/>	
卷第一 文韬	(33)
卷第二 武韬	(69)
卷第三 龙韬	(95)
<hr/>	

《六韬》的作者

《六韬》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六韬》旧本题作周吕望撰。该书最早见诸著录的是《隋书·经籍志·兵家》，内有《太公六韬》五卷，谓“周文王师姜望撰”。《旧唐书·经籍志·兵家》和《唐书·艺文志·兵家》均著有《太公六韬》六卷，以后各代因之。

吕望，姜姓，名望，字子牙。其祖先被封于吕（古国名。传为四岳之后。在今河南南阳西。春秋初年为楚所灭），所以又称吕尚。周初为姜姓部族长。武王伐纣时，吕望率师出征，被尊称为师尚父，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战中卓立战功。成王时被封于齐，建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东），授以征讨五侯九伯的特权，地位在各封国之上，因而又有太公之称。

从吕望所处的时代及《六韬》的内容来判断，这本兵书的作者显然不可能是吕望。首先，商末周初的战争实践，还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军事体系。其次，当时的文字条件还不完备，即使有所记述也难以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古代虽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但从未发现如《六韬》这样的长篇文献，何况须镌刻于青铜器上。所谓“三坟、五典、八索、

九丘”(《左传·鲁昭公十二年》)，都是指文化典籍。“坟”、“丘”又义为高阜、大丘，有保存这些文献地点的意思。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每年都有水患，稍不慎就会被水毁掉。“藏之名山，传之千秋”，就是古代收藏文化典籍的一种方法。因此，从镌刻和保管方面看都是很困难的。春秋期间，孔子整理历史文献时曾感慨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说明商周文献保存下来的很少。第三，从叙述方式看，也不像吕望一人之作。以问答形式探讨问题，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传统。按照一般说法，《论语》是孔子的著述，《孟子》是孟轲的著述，《管子》是管仲的著述，《吴子》是吴起的著述，而这些书的篇首多冠以“某子曰”，因此实际上都是他们的弟子当时的记录，或后人整理辑成的。从体例上看，《六韬》也属于这一类。第四，《六韬》的不少内容，不是当时而是后世才出现的。如“凡国有难，君避正殿”(《龙韬·主将》)，“战骑”(《犬韬·战骑》)，以及《虎韬·军用》中提到的“铁蒺藜”、“铁械锁”、“环利铁索”、“铁杖”等器械，在殷末周初是不可能存在的。根据以上分析，《六韬》不会是殷末周初吕望所撰，很可能是后世托吕望之名编撰的，而编撰者的真实姓名却无从查考了。

自宋代以来，许多辨伪学家对《六韬》的作者和年代，进行了长期而认真的探讨，基本认定《六韬》是后人所伪托。宋代的叶适说：“……然周漫侮为方术者，而不悟《六韬》之为伪，何也？盖当时学术无统，诸子或妄相诋訾，或偶相崇，出

于率尔，岂足据哉。”（《习学记言》）南宋藏书家陈振孙说：“武王、太公问答，其辞鄙俚，世俗依托也。”（《直斋书录解题》）南宋黄震说：“《韬》、《略》，世谓出太公，虽李卫公亦云。以愚观之，伪书尔。”（《黄氏日抄》）明代胡应麟说：“《六韬》称太公，厥伪了然。”（《四部正讹》）清代姚际恒说：“其辞俚鄙，伪托何疑。”（《古今伪书考》）《四库提要辨证》说：“今考其文，大抵辞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殿’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黄云眉在《古今伪书考补正》中指出：“惟一端极可笑者，胡元瑞说，《六韬》有《太公阴符》篇，云：‘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之符长九寸，失利之符长三寸而止’，盖伪撰之人不识阴符之意，以为符节之符也。”

那么，《六韬》的作者究竟是谁？他是什么年代的人？根据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六韬》一书很可能是战国后期由某人托姜望之名撰写成的。这是因为，周朝发展到春秋战国时，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人们不再把字刻到龟甲或竹木简上，而是用硬度较大的铁制的“刀笔”书写在简牍上。由于大量书籍的出现，曾有一种官职叫“刀笔”。《战国策·秦策五》说：“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这应该算是出现了镌刻《六韬》这样长篇著作的客观物质条件。第二，战国是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的时代，频繁的战争需要人们继承和整理古代一切有关战争的经验和文献。周初有一千二百多个封国，到春秋末期只剩下晋、

鲁、燕、齐、中山等十余国，战国时已是七强并立的局面。过去的战争虽然接连不断，但战国时的争霸和兼并战争，在战争的规模、地域方面都比过去大而广了，延续的时间也长了。各国都在尽一切力量取得战争的胜利，它们除采取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其他措施之外，无不注重以历史上的军事学术和作战经验为鉴。第三，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变革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学术界形成了许多流派，各派互相辩论，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诸侯割据纷争的形势下，知识分子们走“公室”（春秋战国时诸侯的家族，亦指诸侯国的政权），跑“私门”（犹“家门”，指权臣的家宅），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而各诸侯国的国君和大贵族，也企图招揽大批知识分子到自己身边，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效力。所谓“诸侯并争，原招游学”（《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是当时这种社会现象的反映。这些知识分子“率其群徒，辨其谈说”（《荀子·儒效篇》），无不以到处讲学为事。在此情况下，诸子蜂起，议论纷纭，产生了儒、墨、道、法、兵、农、杂、阴阳、纵横各家。因此，百家争鸣的盛况，对当时军事学术的发展同对整个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在讨论《六韬》的作者问题时，还应该联系《太公兵法》和“周史”来考虑问题。《史记·留侯世家》提到《太公兵法》一帙三卷。《汉书·艺文志》在兵家权谋类有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同是“道家类”，又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

五篇。这三处提到的《太公》和《太公兵法》与《六韬》是什么关系，后人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者是一回事。《庄子·徐无鬼篇》内有《金版六弢》之说，唐人成玄英为之疏曰：“《金版六弢》，《周书》篇名也，或言秘书也。本有作‘韬’字者，随字读之，云是《太公兵法》，谓文、武、虎、豹、龙、犬《六弢》也。”（见郭庆藩：《庄子集解》）。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是一回事。沈涛说：“案今《六韬》乃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则非今之《六韬》也。‘六’盖‘大’字之误，《古今人表》有‘周史大弢’。古字书无‘弢’字，篇韵始有之，当为‘弢’字之误。”（《铜雀斗斋随笔》）因此，《六韬》究竟是否包括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与《太公兵法》是否同一书，尚难遽断。

再说周史其人。《汉书·艺文志·儒家》中所载的“周史《六弢》”，唐人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这里提到的“周史”其人，很可能与《六韬》有些关系。按照颜师古的说法，此人是周惠王、襄王时代的人，也可能是显王时代的人。如果真有其人，他本人或者他的先世一定当过周代的史官，因而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才有可能将他或他的先世保存下来的有关周文王、武王与太公对话的记录，加以整理而成为《六弢（韬）》的。但“周史《六弢》”，班而是列为“儒家”的。同一“志”内，“道家”又著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兵家”中又提到《太公》，几种书并存而作者非一，恐怕《汉书》的编者班固也不至糊涂到如此地步。因此，也不能肯定“周史”就是《六

韬》的编撰者。

通过以上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吕望、“周史”都不可能是《六韬》的著者。真正的作者是战国后期的某人，是他托吕望之名，将此书编撰成的，而他自己的姓名却隐匿了起来。

《六韬》这本书

《六韬》的作者 虽然尚难搞清，但只要大体分清它是什么时代的作品，也就不难探讨它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对这个问题，历史上和当前学术界大体有以下四种看法：

第一、春秋说。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载有《周史六弢》六篇。二人都认为是“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即认为是产生于周惠王与周襄王时，也就是春秋鲁僖公、鲁文公之际，或者是鲁昭公、定公、哀公时。从历史上看，这大约是春秋晚期，最迟也不迟于战国中期。

第二、战国说。认为《六韬》成书不会在《吕氏春秋》等书之前。其理由是：《文韬》中的《文师》，《武韬》中的《发启》、《顺启》等篇及《逸文》中，反复出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文句，似出自《吕氏春秋·贵公篇》；《龙韬·将威》中的“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民悦者赏之”，似出自《尉缭子·武议篇》；《六韬逸文》中“冠虽弊，礼加于首；履虽新，法以践地”，似出自《韩非子·外储篇》。

第三、秦代说。认为《史记·留侯世家》中圮上老人以

《太公兵法》授张良，《文韬》记太公论兵；还认为张良反秦，同《六韬》反暴政是吻合的。圮上老人的谓张良：“读此则为王者师。”《文韬·文师》专言王者师的治国安民之道、反暴政之道，据此认为《六韬》成书的时代背景与秦代这段历史是契合的。

第四、秦汉之际说。宋代的罗泌在《路史发挥·论太公》中说：“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代的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也称：“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罗、崔二人虽没举出可靠的根据，但他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根据历代著录及出土文物，笔者基本倾向第二种看法。说得更具体点，就是认为《六韬》成书于战国后期。

首先，从历代有关著录来看。前面也已经提到，《六韬》最早的著录是《隋书·经籍志·兵家》，称“《太公六韬》五卷，梁六卷”，有注说：“周文王师姜望撰”。之后，《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兵家亦因之。其实，《汉书·艺文志·兵家》虽不见有《六韬》著录，但在该志儒家中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惠、襄之间，或曰虽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唐颜古说：‘六弢’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因此，不能只看汉志兵家没有著录就否定它在汉以前已存世了。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情况加以印证。战国后期的庄周（约公元前369—286年）曾看过《六韬》。据《庄子·徐无鬼》记载：“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经典·释文》说，司马彪、崔撰称《金版》、《六

弢》皆为《周书》篇名。西汉成书的《淮南子·精神训》也称：“故通许由之意，而《金縢》、《豹韬》废矣。”东汉高诱注：“《金縢》、《豹韬》，周公、太公阴谋图王之书也。”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豹韬》为太公的作品。《淮南子》的作者刘安，是西汉初年人，说明在他之前，太公的著作已流行于世了。《战国策·秦策》说：“苏秦夜发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炼以为揣摩。”苏秦、张仪“俱事鬼谷先生学术”（《史记·苏秦列传》）。因此他的这部书是得自鬼谷子的。鬼谷子是战国人，说明在战国时，太公的著作是容易见得到的。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特是《六韬》、《豹韬》之名，见于《庄子》、《淮南子》，则是战国秦汉之间本有其书，汉人仅有附益，而非纯出于伪造。周秦诸子，类非一人之手笔，此乃古书之通例，又不独《六韬》为然。”其意在于阐明，早在战国时就有《六韬》这部书了，后人说法不同，只不过是有所“附益”罢了。所以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其次，从《六韬》的内容看。古代兵书是反映和总结其所处时代及其以前的战争实践的，它绝不会脱离或超越时代而反映尚未出现过的事物。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和《司马法》并不曾言骑战。《灵子·励士篇》始言骑战：“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军五十万。”汉刘向说：“战国有骑，无骑射。骑射，胡兵也，赵武灵王用之。”（董说：《七国考·赵兵制胡服骑射条》）《六韬》用了很多的文字谈骑兵，详细规定了选拔骑士的条件，阐述骑兵作战的战术，以及如何与步兵、车兵配合等等。赵武灵王在位的时间为公元前325至299

年，由此可见，《六韬》之所以能总结出如此系统丰富的骑兵作战经验，肯定是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但又不会离此太远。

再说车战，商周时是我国古代车战的极盛时代。春秋以后逐渐衰弱，秦汉时已比较少用了。特别是由于战国时期铁兵器的使用，步战地位日益重要。这就使得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后期出现了骑、步、车并用的时代。《六韬·犬韬》详细阐述了“战车”、“战骑”、“战步”及其相互关系，正是当时所普遍采用的战术原则的反映。车战于战国时期开始衰弱，但真正让位给骑兵和步兵，还是秦汉以后的事。因此，《六韬》将车、骑、步并列，正说明它既不是成书于春秋之前，也不是成书于秦汉之后。

《六韬·虎韬·军用》提到“铁蒺藜”、“铁械锁”、“环利铁索”、“方胸铁把”、“方胸商枝铁叉”、“方胸铁叉”等十来种军器，说明《六韬》不可能成书于战国之前，众所周知，战国以后才进入铁兵器时代。《国语·齐语》有用铁制农具、用铜制兵器的记载：“美金经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衡，试诸壤土。”《吴越春秋》记载有干将、莫邪两种有名的铜剑，但种类单一。只有到战国中后期，铁兵器种类开始增多。因此，《六韬》一书大约产生于这时前后。

第三，从文风上看，大体与《六韬》同时成书的兵书及其他各家的著作很多，诸如《尉缭子》、《孙膑兵法》、《吕氏春秋》、《庄子》、《荀子》等，它们在思想内容、表达方法和语言特点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一些语句完全相同。